

1975年，未滿七歲的我，當時只是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小學生。不過這一年發生的事情，卻是我對民主運動的最初認識。

記得唸小學前後，一夥玩伴的樂趣之一，就是在選舉季節裡，蒐集選舉文宣。當然，以這麼稚嫩的年紀，並看不懂內容是什麼，而我們蒐集的目的是摺成紙飛機在天空飛，或者摺成紙船在家旁的小河漂行。選舉活動對我們而言，只是日常生活中另類的大拜拜。的確，感覺就像廟會中的大拜拜，我們只是在看熱鬧，而當宣傳車經過家門口時，趕緊出去搶車上扔下來的文宣，因為我們又可以做紙船、摺紙飛機。印象中，每逢競選活動會有不同候選人的宣傳車以及隨車扔下的文宣品。然而，1975年冬天的競選時節裡，家門前經過的宣傳車，卻永遠只是喊著同一個候選人名字並且發送同一個候選人的文宣。不禁令我深感困惑：「既然是競選活動，那我手中這張傳單的競選對手是誰？而他又在哪裡？」不知過了多久，我才知道，我手中這張傳單的競選對手就是郭雨新先生。

1975年的立法委員選舉，是我童稚時期第一次留有印象的選舉，也是我知道郭雨新這位偉大同鄉前輩的開始。

1977年郭先生流亡美國，直到1985年逝世。這期間我也從小學、國中到高中。對於郭先生在美國的活動，隨著年紀日漸增長，我愈是想從當時報紙中的隻字片語，試著去了解事情的真相。1985年郭先生逝世，那正是我高一升高二的暑假。消息傳回宜蘭時，當時的情景，到如今我仍歷歷在目。就在家裡的院子裡，兩位上了年紀的長輩有著這樣簡短到不能再簡短的對話：一位長輩說：「郭雨新過世了！」另一位長輩：「……」就這樣沈默以對。郭先生對台灣、對宜蘭有如此大的貢獻與影響，但是在他自己的家鄉，對於他的辭世，卻連個簡短的討論，都變成莫大的禁忌。

如今已是2013年，距郭先生辭世轉眼已28年。經過近百年來

多少人的犧牲奉獻，原本看似遙不可及的民主，終於出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。相信這數不盡的民主先輩，天上有知，定會感到欣慰。不過有時遠望著天邊，我又會突然感到汗顏，因為這民主運動的棒子交到我們這個世代，我們是否有秉持著先輩的精神，讓民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發光發亮；抑或我們只是建立一個令人感到惶惑的民主。

環視當前的台灣，我們發現我們得到的是一個公民精神低落的民主社會。民主先輩的精神在當今的台灣，我們又保留了多少？又或者我們自信有比民主先輩可貴的情操？不過我感到懷疑。我不是歷史退化論者，所以我不喜歡「厚古薄今」、「以古非今」，但面對台灣走向民主的墮落，而非民主的躍升，我們的確需要詳加審視我們民主這條路。

我有一個願望，希望藉著重建郭雨新先生的精神，讓當今自命不凡的眾多政治人物，覺得自己平凡些；更希望郭先生當年拉拔長大的政治人物，能時時想到郭先生的教誨，而不只是在午夜夢迴之際。而對於全體台灣人，包括現在及將來的，希望大家能將郭先生的精神內化成自己的心靈資產，而不要得了歷史失憶症，忘記了大家對過去、對將來都有應承擔的責任……

無可否認的，台灣歷史充滿悲情。不過多年的教學經驗，令我深深體認到，我們要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，不能只是訴說著歷史的悲情。其實在台灣歷史的悲哀無奈中，反而可以看出不少高貴的靈魂、偉大的精神，這對於形塑新世代的公民精神，是不可或缺的。

一個偉大的國家要有偉大的公民，而不只是偉大的領導人。而偉大的公民從何而來呢？歷史教育可以幫助我們做到。郭雨新先生的靈魂，正是我們培育偉大公民的一面好教材。

郭先生是白色恐怖下的民主先行者，是日治到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承先啟後者，更是台灣黨外民主運動之父，相信在結合文獻資料、口述歷史以及郭先生遺留文物等綜合研究後，郭先生的歷史定位會更清楚地呈現出來。如此，則作為歷史研究者的我們，將不會愧對前人，並且對後人有所交待。我們已將台灣歷史上這樣一個高貴的靈魂、偉大的情操，永遠留在這塊土地上。



1908-1950

在宜蘭縣礁溪鄉靠近小礁溪（宜蘭河上游支流）山邊的村子裡，有著我天真、快樂的童年回憶。就在夏天放暑假的時光當中，我和姐姐、妹妹、弟弟大家共同的期待是數著日子，等待著媽媽帶我們去外婆家度假。我們想要看慈祥的外婆、和藹的外公，還有他們那偌大的果園。

果園就在溪邊的山腳下，那是我們最佳的遊樂場所，在那邊可以在樹上爬上爬下享受蟬鳴、蟲叫，也可以在林間玩著捉迷藏，我們最喜歡果園中心的那棵巨大的龍眼樹，他睥睨群雄又對我們如此親切，我們不知道他已經幾歲了，覺得他像是外公又像外婆，他張開雙手，為我們擋住烈日，也替我們遮風避雨。在午後的時光，我們喜歡在他的呵護下，聽表姊講故事，一陣陣清風徐徐吹來，似夢似真的故事情節，更引人入勝。龍眼樹公公永遠是我們心靈的堡壘。

有時我們也會去溪邊，讓溪水洗淨我們的雙腳，溪水剛從雪山山脈俯衝而來，我們還能深深感受那山上的涼意。溪邊的那座小山對我們最是特別，因為從小就在太平洋邊長大，對於海我們是再熟悉不過了。至於山，平常我們總是隔著蘭陽平原的稻花香那麼遙遠地望著，試圖從崇山峻嶺中尋找外婆家後院的那座小山，找到她，我們就彷彿聽到外婆正在山腳下向我們呼喚。每年暑假住在外婆家的日子裡，我們總算有機會親近她，這是我們整整一年的等待。爬山對我們而言是再新鮮不過了，這時我們會從果園一路半走半攀爬地爬到山腰，然後來到山上圓明寺。圓明寺對我們而言也是很驚奇

的，因為我們從小就拜慣了開漳聖王廟，在寺裡供奉的是我們陌生的神像。每次進去拜拜，感覺是格外不一樣。

有一年的暑假，外婆家後院的那座小山上的樹突然被砍光了，那是一個很大的震撼。因為那是我生命中第一座認識的山，而且也產生了深深的依戀（她雖然是一座小山，但童年時代的我，在很長的一段期間，總覺得她是如此高聳，因為在外婆家的院子裡，舉目所及，就只有她巍然獨立，其他的山嶺，不是被她擋住，就是看起來過於渺小）。當時心中充滿困惑與不解，直覺就跑去問媽媽，不過媽媽並沒多說，我就帶著這一團疑惑慢慢長大。終於，我明白了！隨著墳塚從後山蓋到前山，我終於明白了！如今外婆早已在我唸高中時，離我們遠去，1907年出生的外公，在我剛教書的那一年也與世長辭，外公姓吳，礁溪大姓，曾擔任那個傍山小村的村長，也是郭雨新先生的堅定支持者，他和外婆都長眠於山上，繼續守護著他們心愛的家人。這座我生命中第一座認識、依戀的山，就是位於礁溪鄉荊仔崙的宜蘭市第二公墓所在地。郭雨新先生的來台始祖，就安息於此。

一、家世（1810-1908）

郭雨新先生的渡台始祖郭活，原籍中國福建漳州府龍溪縣。1810年，十九歲的郭活和侄兒郭有江冒險搭船渡海移民到噶瑪蘭的五圍（今宜蘭市）。話說漢人吳沙入墾噶瑪蘭是1796年，而中國清政府正式統治噶瑪蘭則在1812年¹，顯見當時的蘭陽平原還是噶瑪蘭族的天下。郭活在今宜蘭市經歷辛苦墾荒後，終於定居下來，噶瑪

1 直到1895年清政府將台灣永遠割讓予日本，中國清政府實際統治宜蘭僅83年。

蘭也從此成為他們的新故鄉。郭活遷居台灣宜蘭後，歷經幾代大多從事農業，至開台第三代郭龍葉（郭雨新祖父之大哥）因為從事碾米工廠頗有成就，郭家因此殷實富有。

而郭活的墳墓在宜蘭市第二公墓，乃位於礁溪鄉荊仔崙山上。由礁溪鄉大坡路進入荊仔崙山麓，由環山道路上山經圓明寺靈骨塔前，向北方再前進約150公尺處，即可看到郭活墳墓。墳墓占地約16坪，橫式黑石金字墓碑：「郭家祖宗之墓園」，係十三位合葬之墳墓。

中國政府近年來，一直透過所謂「認祖歸宗」，以遂行統戰之目的。講述這一段郭家家世，並不是呼應其「認祖歸宗」的論調。其實「認祖」未必要「歸宗」，就算是「認祖歸宗」也大可不必同住一個屋簷下，否則當年何苦冒著「六死三留一回頭」的風險「唐山過台灣」。台灣俗諺說的好：「一人一家代，公媽隨人栽」。所以，郭雨新（郭活第五代子孫）在世時，會動員宜蘭郭氏宗親會支持他，也會和國民黨內的郭氏同宗郭澄、郭驥、郭寄嶠保持友好關係，更曾經接受菲律賓郭氏宗親會的捐款，但他從來不會想要叫大家同在一個屋簷下過生活。所以同祖、同宗基於血緣團結互助，這很正常，硬要變成一家，恐怕會落得「親痛仇快」。

二、成長歷程（1908-34）

宜蘭公學校（1916-22）、宜蘭農林學校（1926-31）、台北帝國大學（1931-34）

郭雨新，1908年8月20日，誕生於今宜蘭市。家中是書香門第。父親名郭根生，是清領時期的秀才，精通漢學，並且胸懷濃烈的漢族思想。日本人接收台灣後，他不顧日人的壓迫，在漢族思想的驅使下，致力於保存和提倡漢學的工作，從而設立私塾傳授四書

五經，招致日人的忌恨。

郭根生為人耿直豪爽，待人誠懇真摯，具有一股俠義的風範。郭雨新的母親名吳笑。郭根生和吳笑育有三個兒子，長子名雨降，次子名雨新，三子名雨參。

在名義上，郭雨新有三個媽媽，分別為林氏、黃氏以及生母吳笑。林氏，宜蘭市人，是郭根生指腹為婚的太太，也是林衡哲醫師祖父林奐的妹妹。還沒結婚，十六歲就過世了，郭根生娶她的神主牌位為妻。黃氏，宜蘭市人，是以前地方官的後代，娘家有錢有權。黃氏為郭雨降生母，生完雨降沒多久過世。吳笑，礁溪四城人，為郭雨新、雨參生母。娘家家境亦不錯，有好幾千租的田地。不過，以前的女子，娘家雖然有錢，但習俗上嫁出去就是別人的，所以後來郭家頓時中落，徒呼奈何！這也就不難理解，當年郭家雖然是和地方仕紳、豪強聯姻，但一旦郭家垮了後，苦日子還是免不了的。

郭雨新在接受日本式正規教育前後，曾經學了三字經、千家詩與四書五經等。據和郭雨新同年（1908）出生的小阿姨吳月英說：「雨新仔的老爸是做漢學老師，都在教人家讀書，男生、女生都教。他先唸幾遍讓學生聽，然後再叫學生到面前唸給他聽，看可不可以。雨新仔也跟著老爸讀漢字。」

1916年，郭雨新進入宜蘭公學校（今宜蘭市中山國小）就讀。由於父親郭根生個性的慷慨豪俠，在一次替朋友做經濟上的擔保之下，不意對方事業失敗，欠債沒有辦法償還，郭根生於是以擔保人關係負責賠償，變賣所有動產和不動產，才把這件事了結下來。由於這一空前打擊，致使他因憂成疾，腦溢血一病不起，最終離開人世，年僅四十歲。郭雨新小阿姨回想當天的情景說：「那天一大早，姐夫好像要去佃農那邊或者是哪裡，出門前就因煩惱過多，

突然中風了……」郭雨新姪兒郭時鑿也回憶說：「我阿公根生，為人很正直、古意，是有錢人，有田租七、八百租，也有點現金。後來幫兩個人作保，這兩人都放乎伊倒。我們郭根生有錢，只好賠人家，一時土地賣不出去，就交給法院處理啊。結果都被法院查封了，封到沒有錢，人變得很鬱悶，就過世了。」

這是郭雨新五年級要升上六年級的時候（1921年），所遭遇到的家庭變故。郭根生過世之後，郭家一貧如洗，留給太太的是三個孩子：長子雨降，十七歲；次子雨新，十四歲；三子雨參，僅十歲。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擔，全落在三十六歲孀婦吳笑一個人身上。她白天替人家燒飯、洗衣，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；夜晚替人家補衣、刺繡，得到的經費當作孩子的教育費用。郭雨新則於1922年公學校畢業後便輟學，在母校謀得一份工友的差事，每個月的薪給是四十五錢，就這樣母子勉強得以餬口。郭雨新小阿姨說：「畢業時，老師留雨新在學校當工友，是沒有做粗重的工作。老師看他不錯，原本想叫他幫忙教書。但因為教書要穿鞋子，不能隨便；由於家境太窮，根本買不起鞋子，所以他不敢去當老師！就留在學校當工友，因為當工友不用穿鞋子。」姪兒郭時鑿也說：「我二叔腦筋不錯，老師通常講一遍、教一遍，他很容易就記住。畢業後在學校幫老師的忙，做工友，寫黑板、拿開水……不用做粗重的，就盡自己的力量，做事打拚就好。這樣順便讀書。」

在擔任工友期間，郭雨新刻苦好學，曾進夜間青年研究會學漢文。1926年，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（今國立宜蘭大學）創校，郭雨新參加入學考試，在來自全台各地八百多名考生中，以第一名錄取。

當時入學費是日幣一百元，大多數的親友反對他入學，幸好寡母吳笑力挺，自林家母舅（林衡哲醫師祖父林奐）借得一百元後，勉強得以入學。但讀了半年，又因學費負擔困難，行將輟讀。恰巧

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社長板橋五少爺林松壽來宜蘭旅行，經由蘇耀邦老師的介紹，獲悉郭雨新苦學的經過，認為他大有可為，值得造就，於是就解囊資助他，每月給予津貼十五元。

為什麼林松壽願意伸出這及時的援手？話說林松壽是林維源最小的兒子，林維源是當時板橋林家的掌門人，全台首號大地主。當甲午戰爭戰敗，清廷割讓台澎，台灣人民成立「台灣民主國」用以對抗日本的時候，林維源被推舉為議長，但他堅辭不就，走避廈門。1899年林松壽就在廈門鼓浪嶼誕生。林維源有十個太太，松壽是「九太」（第九個太太）所生，「九太」是宜蘭頭城人，與郭雨新的父親郭根生熟識，種下日後林松壽資助郭雨新的淵源。

由於郭雨新的勤奮苦學，三年級時被列為「特待生」，免繳學費。然而四年級時，由於日本人軍訓教官歧視台灣人，軍訓只給郭雨新七十八分，郭雨新就失去了「特待生」的資格。五年級時郭雨新到日本進行修業旅行，這應該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離開台灣。

自從得到林松壽的資助後，郭雨新更加奮發，一面種菜、挑水、做工，一面潛心苦學，到畢業為止，每學期成績都名列前茅。他的勤奮苦學和力求上進的事實表現，並沒有辜負林松壽培植的一番苦心，同時也為郭雨新個人的學業奠定了初步基礎。

1931年，郭雨新以第一屆畢業生的身分，畢業於宜蘭農林學校，同時保送進入台北帝國大學農林專門部就讀農業化學。因此，林松壽對他的寄望，更加殷切，繼續資助郭雨新，囑咐他搬入林松壽的私人寓所（在台北四條通），食宿及其他的一切費用，完全由林松壽供給，每月資助他三十五元，並且時常對郭雨新加以勉勵。郭雨新在二年級時，由農業化學轉到農業經濟系。三年級時到滿州國畢業旅行。1934年3月郭雨新從台北帝國大學畢業，畢業論文〈農業政策〉，轟動全校，為師生一致推崇。

一、任職板橋林家（1934-39）

1934年3月郭雨新從台北帝國大學畢業，林松壽便把他安頓在自己的會社裡，任命他當租務主任這個重要職務。受到這樣的眷顧，使得郭雨新盡最大心力，以求回報林松壽的恩情。

由於郭雨新做事守法謹慎、熱心負責，一年後，林松壽便提拔他當會社的經理。

另一方面，畢業同年6月，郭雨新與石宛然結婚。石宛然，1915年出生於苑裡，父親是石安美，一位基督教牧師。她畢業於台北第三高女。婚後夫妻生活頗為甜蜜、融洽，我們由日治時期郭雨新任職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經理時，在題為〈新家庭訪問記〉的報刊短文裡，可以捕捉到一點影子。

我們到郭君雨新家庭的時候，已經是午後六時許了，他們是住在市內大正町四條通的，真是可敬的一個小家庭，也許他們才結婚不久的，不但富有新生活，而且夫婦青春的情火還在燃燒中，他們皆是十字架下的門徒，愛情的甜蜜，大有一刻萬金的可貴……黃金色的晚霞，映照著他們一對雙棲佳景，談話間，夫婦時相秋波交吻，含羞不答……

這篇訪問短文中，也為我們留下了當時郭雨新夫婦的一些思想、觀念。郭雨新認為人生是苦痛的，忍受苦中苦，才是享受樂中

樂的來源；做為一個人必須要有隨時隨地苦鬥的精神，否則恐怕會有淪為落伍的憂慮。同時在時序上也從婚前的理想來到了婚後的實際，發覺到這兩者間的落差後，即使郭雨新已如此順利，仍感覺到婚後已不像婚前可以任理想憑空想像，而實際感受到責任感。對於台灣青年，當時以青年新貴姿態出現的郭雨新，認為台灣青年要有向海外發展的心志，尤其是向海外開拓台灣青年經濟之路。假若可能的話，郭雨新還願意做這前進的一分子。

郭太太是虔誠的教徒，她相信世間有神，人類的力量有限，須有神的力量幫助；耶穌的人格是其敬仰的，若能學習這樣的人格，必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。她關心台灣許多可憐無依的兒童，希望將來能創設一個孤兒院，獻身教養這些兒童，以免這些可畏的後生，墮落為匪類。對於台灣婦女界，郭太太認為台灣婦女若以為丈夫供給妻子的一切是義務，妻子只要負責家庭工作和生兒育女而已，這樣是錯誤的和不夠的。她認為身為妻子，安慰丈夫的精神是比一切更重要的。此外，她也體認到台灣婦女界尚有許多不好的習慣，譬如說多言、非禮、批評人家的是非、不知自己的壞處。對於兒女，她希望兒女除了受本國教育以外，能更進一步多受外國教育，以做為海外發展之用，而成為一個具有世界觀的人物。最後，郭夫人談到她日常的興趣為音樂、英文、旅行、整理家具和研究家庭料理。

郭雨新遠赴中國以前，在台灣的一些活動如下：1935年郭雨新造訪全會社佃農、佃頭的耕作及生活。1936年郭雨新升任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經理（家長），同時廢止了佃頭制度。1937年郭雨新參加業佃會。1938年郭雨新參加三六會反對日本總督六三條例，這一年同時被日治當局徵召擔任通譯三個月。

二、擔任台籍日本兵（1938）

1938年9月間，台灣總督府徵召台北市的名人去當軍伕，包括：林熊祥、顏德修（以上知名富戶）、陳逸松、李瑞漢、陳增全、吳鴻麒（以上知名律師）、邱德金、施江南、葉貓貓、翁瑞春（以上知名醫師）、張鴻圖、姜鼎元、陳金萬、黃逢春（以上知名企業家）、郭雨新、林佛樹（以上知名青年知識分子）。徵召這些人動機何在？根據陳逸松的回憶說，1938年，日本為配合武漢大會戰，計劃由大亞灣進向惠州，再攻取廣州。惠州是客家莊，日本在台灣徵調一些客家人如米穀取引所的姜鼎元等當軍伕，但怕報紙走漏攻打惠州的消息，也徵用了一些河洛人。9月的一天，郭雨新到陳逸松的法律事務所來找他。一見面就說：「這下可糟了，我被調做軍伕，幾天內就要入營了。」陳逸松心想郭雨新已經結婚，他又是個孝子，母親年紀大了，聽到兒子要去當軍伕，一定很難過，於是到市役所（市政府）去找兵事課長說：「郭雨新是林本源的家長，怎麼可以調他去當軍伕呢？」「這是軍部的事情，與市役所沒有關係，我與軍部沒有什麼連絡，只有奉命行事，其他我無能為力。」兵事課長回答說。於是陳逸松悻悻然回家，哪知道一到家，竟然發現自己的召集令也來了，三天內就得出發。原來大稻埕的大商行，從布店老板到南街（永樂町）的商店老板，多被徵召，就連林柏壽（當時人在香港）、林熊祥、顏德修等也不例外。陳逸松因故沒去，郭雨新倒是被徵召了。10月12日，日軍在廣東的大亞灣登陸，15日陷惠州，21日陷廣州。郭雨新當了三個月的軍伕，平安歸來，他告訴陳逸松，他雖然是做通譯，但擦鞋、端茶樣樣都來。當然人在面臨未知命運時，難免會恐慌，不過郭雨新此次被徵調去當軍伕，如果像陳逸松所言「僥倖平安歸來」，可能言過其實，一來此

次徵調行動宣傳大於實質意義；再說，郭雨新後來向他的助理高銘琛提及此事時，所說的是，當時艦隊進抵大亞灣登陸時，竟然沒有任何軍民抵抗，就逕行登陸了。整個戰事是出乎預料的順利。當然看高銘琛的眼裡，這是老闆在提當年英勇的事蹟，表示自己神勇的一面。

三、離台赴中（1940-46）

林松壽平日經常往來於台灣與中國之間，1937年抵達福州後卻突然失蹤，下落不明。郭雨新數次往來上海、香港調查此案，都無結果。

根據陳逸松的回憶，林松壽幼讀詩書，二十歲赴日留學，後到上海，廣為交遊，並曾遊宦北京，一度供職交通部，出任交通署長，同時加入北平台灣青年會。1924年，他回台創辦林本源松記建業株式會社，出任社長，因常遭日警監視，此後遂往來於台灣與中國之間。林松壽擁有很多房產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廈門、台北、東京都有他的公館，而以住上海的時間居多，他的幾個太太也都住在上海。林松壽只有一個兒子，就是林子畏。林松壽坐鎮上海，遙控他的事業，有一套有趣的遠距離收錢方法，他要他的家長每天製作報表，登記收入支出，每天郵寄給他，以郵戳為憑，叫你忙得不可開交，而又造假不得。林松壽的左右也有一些人，陳逸松的東大後輩王柏榮就是他的高級秘書，王柏榮介紹陳逸松當林松壽的法律顧問。那時陳逸松常去上海，因為業務關係住在上海法租界海格路林松壽家的時候，常常看到林松壽抽鴉片，抽到不知天亮。1934年，國民政府成立禁煙督察處，直隸軍事委員會，蔣介石提出「兩年禁毒、六年禁煙」的口號，其計劃是由中央監督控制地方的鴉片

專賣權，鴉片煙行須有執照，煙民吸煙數量須有限制，並且規定六年內要戒掉煙癮。林松壽認為鴉片生意有厚利可圖，擬向福建省主席陳儀購買福建的鴉片專賣權，1937年初，陳逸松到上海和林松壽會合，連同王柏榮三人一齊來到福州林熊祥的家。林熊祥，論輩分，是林松壽的堂侄，稱呼林松壽「五叔爺」；論年齡，要比林松壽大三歲。林熊祥在福州的宅院很大，所以他們就住了下來。林松壽跟福州當局洽談，先繳五十萬元，再向禁煙督察處申請專賣權，錢是繳了，但手續卻一直在拖，辦得很慢，恰在這個時候，蘆溝橋事變發生了，新聞登得很大，反日氣氛一濃，台灣人就會遭殃，陳逸松看情況不對，就對林松壽說：「五少爺！我想我們還是回台灣才好哦！」「這下可糟了，五十萬元被拿走了，要討回來可不容易啊！」接著林松壽又說：「應該沒關係吧！戰爭不會很久的，以前也常發生類似的事件，最後還不是都解決了，政治歸政治，經濟歸經濟，委員長說過禁煙督察處一定要做，不用擔心。」可是情勢的演變，不如林松壽的預期，反而變得更加嚴重，許多台灣人在福州，或挨打，或是被殺，於是陳逸松再對林松壽說：「五少爺！我想我們還是回去吧！」「我現在還不想回去，反正五十萬元被陳儀拿去了，我要等事情辦妥再回去。」「你若不回去，我們先回去了。」「好吧！」於是陳逸松先回來，王柏榮再陪林松壽一段時間，看情勢實在危險，還是勸不走他，也只好走了。後來林松壽就失蹤了，聽說被陳儀抓去永安拘禁（福建省政府後來遷到永安），既無鴉片可抽，煙癮難忍，加上食物不佳，營養不濟，日漸消瘦，終至病死獄中。錢被吃了，命也賠了。

郭雨新這當中花盡心血，想要找出老闆林松壽的下落。郭雨新姪兒郭時鑿回憶說：

林松壽說要去上海，要我二叔陪他去。他很信任我二叔，所以就一起去上海了。之後，他又跟我二叔說要去福州，他說他要住在福州，上海的事業就交給我二叔全權處理。他在福州也有事業。我二叔把上海的事業管理的很好。後來林松壽沒回來，我二叔趕去福州，聽說他和土八路（八路軍）在一起，他們說要保護他，不過等到他沒錢時，就不保護他了。我二叔發動很多人去找、去救他，後來沒消息。聽說在很偏遠的山頂上，有群伐木工人，說有看到一個人快要死了，金牙齒都拔出來賣，在跑路。是有這個人啦！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林松壽。再來，就沒有林松壽的消息了。我二叔只好回板橋林家，告訴林松壽兄弟林柏壽等人，他們就說台灣這些事情就交給郭雨新你處理，要弄到好。老闆不在了，我二叔心裡很難過，他不能綁死在台灣，所以想到上海再去找老闆。他把事情交還給林柏壽，林柏壽再交給林松壽的兒子，這些事情都交代好以後又去上海。到上海之後都在找，上海——福州到處找，找到山頂上也去找，他都花自己的錢。他對老闆有一個感恩的心，自己又再去找，但還是沒消息。只好回來台灣，沒什麼頭路，回來三、四個月，又回去上海。

郭雨新為何會在1939年離開板橋林家，而於1940年前赴中國上海經商？林松壽失蹤後，林松壽兄弟林柏壽等人雖然要求郭雨新要負責處理好林松壽的事業，但由於郭雨新過度的道德勇氣卻導致其不得不去職。林松壽失蹤後，郭雨新看到其獨子林子畏隨意亂花錢，認為這個孩子不禁治產不行，結果這事鬧得很大，因為不只林子畏和他關係緊張，而板橋林家各房看到林松壽僱請的家長如此舉動，也議論紛紛。加上郭雨新因不滿日本人的統治，遭受日治當局注意，乃向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辭職，前往上海經商。

在當時上海商業鉅子王繼呂的協助下，郭雨新先後創辦了新泰宏煤行、華新煤球廠、華新實業公司等事業，經營堪稱順利。在上海期間，郭雨新曾擔任台灣同鄉會的理事，從事反日行動。但1945年，台北日本憲兵隊長奉調至上海，他想不到當年的冤家又再碰頭，為了避免意外的麻煩，乃遠去北平。直到戰爭結束次年，全家才搭船到上海，由上海回台灣，同船的有吳三連、蔡培火等人。

第三節 | 郭雨新的政治理念與心路歷程

身為郭雨新先生的宜蘭同鄉後輩，筆者對孕育郭先生的這塊噶瑪蘭大地，有著很深的體會。

在東亞地區最著稱的氣候景象就屬颱風與寒流。颱風雖然來勢洶洶，但來得快也去得快，很快就被亞洲大陸給衝得鳥獸散。寒流雖然不若颱風銳不可擋，卻是無孔不入漸進侵襲，由秋天到冬天一波一波走向高潮，即使到了春天，還不時一再給人臨去秋波。或許天候使然，台灣人的性格就像颱風，雖然剽悍，可惜氣不長。

冬天的「蘭雨」，由於冬雨綿綿，甚至可以陰霾整個冬季也難得綻放冬陽，噶瑪蘭大地因而誕生了不少細水長流、堅韌一生的偉大靈魂。

郭雨新先生可說是其中的典型。

噶瑪蘭原野上的子民，成長於雪山山脈的青山綠水、太平洋濱的海風吹拂、龜山島嶼的守候呵護……那是一個遺世獨立的天地！

噶瑪蘭的浮雲遊子，當他們沿著北宜公路翻過雪山山脈，映入眼簾的故鄉，會讓您內心悸動！每一彎、每一拐，您漸漸地投入故鄉的懷抱……歷經了九彎十八拐後，故鄉噶瑪蘭大地終於將您緊緊擁入懷裡！

當火車不知穿越多少山洞，霎時間海天一際，龜山島巍然獨立，綿延的山嶺交織著蘭陽的海灣，故鄉就在前方！

噶瑪蘭的子民們！這就是我們心愛的故鄉……

筆者深深相信，郭雨新先生終身熱愛故土的情懷，就在當中孕育成長。

除了自然環境的陶冶以外，噶瑪蘭大地的歷史，也深深形塑她的子民。

郭雨新先生在人格養成的過程中，有一個既是同鄉前輩又是全島著名人物，出現在他的意識之中，那就是蔣渭水。

蔣渭水出生於1891年，地點也在宜蘭市，幼年的生活當然也在宜蘭市度過。他大郭雨新十七歲，他活躍於政治舞台的時期，正好就是郭雨新的青少年時期。他於郭雨新進台北帝大那一年——1931年8月5日過世。郭雨新在這一時空交織的時代背景下，自然受到了蔣渭水的影響。何況郭雨新和蔣渭水又是親戚（蔣渭水太太是郭雨新姨丈的妹妹）。郭雨新從小就耳濡目染蔣渭水的生平事蹟，蔣渭水是他小時候崇拜的偶像。郭雨新在參加「宜蘭縣旅北同學會」中，經常提起蔣渭水的事蹟，以及蔣渭水給他的影響。郭雨新在1975年競選立委時，所發表的〈為競選立委告各界書〉，也曾表示，蔣渭水為台灣同胞的民權和自由，奮起領導台灣同胞與帝國主義抗爭，數度入獄，不改其志，而至死不懈。這對其影響極大。為了繼續完成台灣先輩們所爭取的民權理想，郭雨新因而毅然投身議壇。

郭雨新具典型噶瑪蘭子民的精神——質樸、堅韌、勇勁的性格，讓他由衷迸發出正義的使命感、點燃了反抗強權的心志。這終使郭雨新在日治時期走向反日行動，因而被迫首次遠離家園。